

2020,披荆斩棘

(下)

出不去的留学生

本报记者 尹晓燕

离上课只有10分钟了,马骁抱起电脑冲出宿舍。那会儿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50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栋教学楼灯火通明,一直到天亮,都有人在那里上课。

2019年底,高三学生马骁收到了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随后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却让他无法如期飞赴大洋彼岸。在马骁此前就读的北京某所公立中学的国际部,220多名毕业生跟他遭遇了同样的困境。“除了大约30人选择休学,其余的都像我一样‘在家门口留学’。”马骁说。

一开始,美国南加州大学大一学生刘博宁很难接受现实——他连学校宿舍的室友都选好了,最后只能在家中的卧室开始大学生活。昼夜颠倒,网课没有参与感,刚开学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刘博宁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中。有一天上课时网络不通畅,看着自己毫无表情的脸久久卡在屏幕中,那一瞬间刘博宁崩溃了,操起电脑狠狠砸在地上。

和刘博宁一样,不满20岁的羽嘉大概从初中起就一直为“申请国际名校”这个目标准备着。等她终于拿到理想中的offer后,却遭遇了也许是史上最强大的“不可抗力”。

“三次签证预约全被取消了,我觉得全世界都在与我为敌。”疫情出现初期,羽嘉一直抱着“过一阵就好了”的期望,随着时间推移,期望变成了失望。

线上学期开始那会儿,羽嘉夜里上课白天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爱美的她,这一年穿得最多的是睡衣——有时候她一个星期也不出一次门,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本该远飞的孩子滞留在家,同样焦灼的还有父母们。羽嘉的妈妈每周变着花样煲汤、做菜,保证女儿半夜也有吃有喝。“她屋里亮着灯,我就跟着睡不着,早上出门前还要蹑手蹑脚生怕吵醒她。”时间长了,羽嘉妈妈觉得自己都快撑不住了。

根据教育部2020年3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时中国海外留学人员总数约为160万人。疫情发生后,其中不少人陆续回到国内。在刚过去的2020年秋季学期,网课是他们中大多数与“学校”的最大关联。

相比起来,马骁是幸运的。经过塔夫茨大学的协调,该校滞留在中国的学生可以在北京师范大学借读,进行线下国内课程+线上美国

课程的混合式学习。塔夫茨大学请了专职人员照顾这些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去年冬至那天马骁和同学还一起包了一顿饺子。

“中国985+美国前30”,马骁笑称这是疫情带来的“福利”,否则他不会有机会感受国内高等学府。马骁选了两门线下课,三门线上课,在北京时间和波士顿时间中来回切换。

北京时间晚10点,纽约时间早10点,伦敦时间下午3点……在家留学生的时间逐渐失焦。有一次,刘博宁把凌晨两点的闹钟错定成下午两点,结果错过了一场考试。也有国外大学增加了课程录播服务,马骁一门讨论课的老师主动召集所有中国孩子,把原本设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半的课调整到晚上10点。

刘博宁换了新的电脑,升级了网络,每天在笔记本上写下24小时内要做的事情。后来,他还在卧室里放了一个小冰箱,以便“深夜食堂”随时开张。

“心静下来,学习效率还挺高。”刘博宁说,没有住宿费、保险费等支出,这学期他给爸妈省了不少钱。

这样的自我安慰切实在又无奈。缺少社交,难以感受鲜活的大学校园乃至外国环境氛围,始终是刘博宁们目前难以解决的痛点。在留学生家长微信群里,有家长抱怨,“花着几万美元的学费上‘函授’,真的亏大了。”

就连置身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的马骁,由于特殊的上课方式和时间,事实上也很难参与社团和校园活动。有时候坐在教室里,他会觉得恍惚,“这是别人的学校,与我无关,可我的归属又那么遥不可及。”

上网课期间,羽嘉看了许多辗转多地到达美国的经验分享:飞去东南亚国家办签证,双向隔离,耗时一个月,价格高昂——虽然到时候依然是上网课。她有点动心,把相关的信息发给了母亲。回复来得很快:与你的安全、健康相比,学业永远都只能排在后面。

很快,欧美大学2021年的春季学期就要到来,有的获得签证的学生准备接种疫苗后“勇敢”向前走,但大多数的留学生家庭依然选择观望。经历了最初的慌乱、焦虑,这个群体似乎已经适应了曾经确定的、可以预期的轨迹一去不复返。

羽嘉没再执着于立即出国。学期后半段,她每天深夜时分会发一条朋友圈“早安,一天开始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再发一条:“下课,准备睡觉,晚安。”

根据排班,2020年的最后一天,邓磊值夜班。从医16年,他早已习惯了逢年过节不放假,不过在走进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之前,邓磊还是默默地许下了第一个新年愿望:今夜收治病人数为零。

“或许因为这是大不平常的一年。”12月31日下午,本该睡觉来养精蓄锐的邓磊怎么也合不上眼。同样湿冷的天气,同样喜庆的节日氛围,邓磊的思绪被牵回了2020年1月下旬的那一天。

那天是大年二十九。凌晨武汉宣布封城,下午邓磊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大年初一随四川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前往武汉支援。当时,邓磊一家人正在提前吃团年夜饭,一时间,桌上的人都陷入了沉默。

作为四川省人民医院EICU的副主任医师,邓磊常年与危急重症打交道,先后参与过汶川、玉树、芦山地震急救,“派我去,连妻子都觉得是必然”。

话虽如此,当时武汉形势严峻,人们对新冠病毒了解又很少,一线到底有多大风险谁也说不清。上飞机前,邓磊想方设法在家里储备了800个饺子,给妻子李菲菲留下一句话:“银行卡密码你都知道,家里有你,我放心。”

此时在武汉,王登福第二次接到了病危通知书。他的妻子、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党委书记黄桂华感染新冠肺炎后病情持续加重,已经命悬一线。

黄桂华的病房外,医护总数不足400人,床位仅有300余张的红十字会医院,每天有七八百位发热患者前来就诊。院内感染严重,医疗物资紧缺,一切都在崩溃边缘。1月26日,当邓磊所在的小组进驻时,有医护人员在电梯里看到他们就哭出了声。

黄桂华成了邓磊和同事在武汉接手的第一位重症病人。“病人交给我们,这里有感染风险,你赶紧离开。”直到现在,王登福还记得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黄晓波对他说的这句话。

邓磊被安排到重症监护室工作,那里有江汉区病情最严重的一部分患者。一方面,要为了医护人员的安全进行“三区两通道”改造,一方面是限于人力、物力,大量病人无法收治,再一方面,还要面对前期重症患者不断离去。在红十字会医院最初的一周多时间,援鄂医护人员每天都被无力感

包裹着。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手边的药,也不能完全相信床旁的设备,我们只能努力到无计可施,然后百分百地相信病人。”在与妻子的一次通话里,邓磊这样说。

那个冬春之交,太多的画面、细节被写进了无数的报道里。为节约防护服数十个小时滴水不沾的护士,随时准备出发的志愿车队司机,病人去世后决定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的家属……对邓磊来说,到最后,一切都浓缩成几个数字:援鄂54天,参与抢救58人次,最长的夜班持续14小时,22名危重症患者经他之手离开ICU逐渐康复。

这其中,就包括黄桂华——经过44天的治疗,她出院了。

在武汉期间,黄晓波曾与红十字会医院的院长约定,疫情过去后他要和队员重回武汉,与并肩作战的同行一起喝一顿酒。还没等到这个约定践行,当年8月19日第三个“中国医师节”,黄桂华与医院的一部分同事就带着热干面和锦旗赶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看望曾经援助过他们的医护人员。一同去成都的还有王登福,“我要作为病人家属去感谢他们”。

黄桂华说,由于时间仓促,本来锦旗来不及制作,但听说是送给曾驰援过武汉的医务工作者,

邓磊的妻子李菲菲画下邓磊前往武汉前的画面。
 受访者供图

在武汉期间,邓磊(左)为新冠肺炎患者输液。
 受访者供图

解封后的武汉城

空那根一直紧绷的弦才稍微松了一点。71岁的马瑞湘家住江岸区一元街三阳社区,他记得,检测结果出来后,小区楼下终于又能见到散步遛弯的人或健身锻炼的人。他自己那时也终于同意子女上门探望。

即便如此,过去这一年武汉人的聚会还是少了很多。家住江岸区的殷汉荣家中三代人都在武汉生活,过去一年聚个六七回不在话下。2020年直到国庆节,大家才头一次聚齐。至于往年常见的朋友、老邻居,“只要通过手机知道大家都健康平安就够了”。

无新增确诊病例的天数一天天增加,销声匿迹很久的广场舞重回武汉街头,可曾经的积极分子、65岁的李春梅(化名)却再没去跳过。因为她是一名新冠肺炎治愈患者。

病愈后第一次出门买菜,李春梅在回家的电梯里遇上了一对祖孙。见她按下楼层后,那位奶奶迅速护着孙子躲到了角落。“哪一层哪一户有病人家都知道。”还有一次,她在家附近的超市碰到同小区“舞者”,对方远远看到她就迅速往反方向走去。李春梅不怪这些邻居,“生病时我也怕得要死”。直到现在,她也没再在跳舞队的微信群里发过言。

她说,自己最后一次跳广场舞,是在方舱医院。

让李春梅略感欣慰的是,同为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的儿子和儿媳很受单位同事照顾,工作没有受到影响。“不过他们也很注意,随时戴着口罩和手套,每天自己带午饭,在没人的地方解决”。

如果经历过武汉最难熬的日子,大概很难去责备人们对病毒的恐惧。复工复产后,湖北省总工会曾在调研中收集到一个真实案例。入夏后,某企业一位工人因为在午休时户外运动体温升高,返回车间后测温仪自动报警。十几秒内,上百名工人全部“撤”到车间外开阔处,几分钟后,身着防护服的应急小分队成员就赶来包围了

坐过山车的外贸人

本报记者 邹偶然 本报实习生 林倩惠

电子电路展览会。想要活下去,开辟国内市场势在必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医疗用品企业数量激增,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原料的巨大需求。森讯隆生产的电路板,就是许多医疗仪器的必需品。

7月,订单量触底反弹。8月底,内销与部分恢复的出口订单相加,森讯隆的车间恢复到往年同等开工状态。进入第四季度,张龙手里的订单已排到了2021年。

在东莞,作为支柱产业的玩具行业也在下半年迎来大翻盘,有企业2020年的全年订单比2019

“疫”线归来的医者

本报记者 李娜

“师傅一口答应连夜给赶制出来”。

从武汉撤回后,邓磊很快回到了原本的岗位,生活也恢复到往常的节奏。由于当天有重要的医疗任务,他甚至没能与黄桂华见上一面,只有同事转交的热干面提醒着特殊客人的到来。

不过,邓磊与红十字会医院的故事一直就没有结束。近两个月的全力以赴让他对医者的责任和使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医患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此外,两所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已建立了“重症数据管理专科联盟”,通过实时数据共享和线上指导,实现长久合作。

2021年,邓磊还有一个心愿,“等有时间,带着妻子孩子去一趟武汉,去看看那座城市恢复如初的烟火气”。

2020年秋季学期,上海纽约大学临时额外招收了2800多名学生,其中大多数是在纽约校区注册的中国留学生。

人民视觉供图

版式设计:陈子蕴

2021武汉平安

跨年夜,武汉市民高举“2021武汉平安”横幅。
 人民视觉供图

武汉“同济健康天桥”桥面护栏上间隔着的每一块玻璃上都印上了疫情期间全国援鄂医疗队的名字。
 人民视觉供图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二维码